

# 爱国知识分子——陈潜夫

□ 陶诗秀

## 义勇军出川抗日

陈潜夫出院后，应冯玉祥将军邀约，远赴甘肃，主持平民教育。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陈潜夫闻讯，立刻南下参加，到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任宣传股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陈潜夫在武汉因不满蒋介石玩弄政治权术，愤而离开军政界，并誓不为官，决心致力于文教事业。他于1928年辗转至北京，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后来，他又抵上海，由许德珩介绍到暨南大学任教授。

1931年1月，陈潜夫的母亲逝世，他奔丧回川。到成都后，经人介绍，陈潜夫开始在“中山大学”（后改“尚志学院”）任教。也就在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吞了我国的大片领土。事变发生后，陈潜夫与新婚妻子杨逸邨及“尚志学院”的同学们一起，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号召民众抵制日货。这期间，陈潜夫在讲课时，也常举他在日本受辱的事例，愤激痛述殖民地人民之惨苦悲愤的情景。有一次，他作了长篇时事演讲，分析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地理、文化、科学、教育、军事等的历史和现状，断言日本占我东北之后，必不满足而止步。他还进而引用大量的外交条约、政府函电、各国报刊，分析阻止日本侵略的各种力量，指出依赖“国际联盟”纯属幻想；而国民政府妥协和，绝不可靠；欲免危亡，当务之急是首先组织一批觉醒的义勇之士，用自己的血肉去敢死，唤醒酣睡之民众，从而迫使政府出兵抗日，以中国之自强取得国际地位。他说：人生一世，终有一死，当死于保国家安全，图民族生存，谋世界和平，申人类正义。一人舍死，万夫莫当，四万万同胞皆能舍身救国，何愁中国不胜？陈潜夫两小时的演讲，对学生影响巨大。杨逸邨在半个多世纪后还回忆说，这一次演讲雄辩激昂，我做了详细的笔记，当夜和同学通

宵议论，诵岳飞《满江红》词，下定了要参加敢死队的决心。后来，同学们经过整理，把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印成传单，发到校外，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陈潜夫当时还与成都市各界民众反目救亡团体合并组成的“四川抗日救国大会”联系，组建了“四川义勇军总监部”，积极进行组建“抗日义勇军敢死队”。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后不久，“抗日救国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于2月18日正式成立。全体队员一致推选陈潜夫担任队长，并通过了敢死队公约、宣言和誓词，规定了吸收队员的条件。队员中有教员、职员、工人、学生，共27人。队员都是经过反复挑选才批准参加的，其中多数有军政经验，包括黄埔军校毕业生。当天午后1时，在省农会举行授旗典礼，由陈书农市长授旗授印，陈潜夫队长受旗受印，并领导全队宣读誓词：“予谨以至诚，接受本军一切主张，绝对服从命令，誓死救国，歼灭倭寇，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极刑。此誓。”

当地政府官员最初不支持敢死队。为争取抗日的合法地位，陈潜夫选定了成都军政界上层做工作。一天，他去找川军饶辅师长交谈。他们本是乐山同乡，叙完乡情后，陈潜夫对饶讲述了国难当头、成立敢死队欲誓死抗日救国的情况后，饶不断点头称是，随即叫勤务兵送几封大洋给敢死队，作活动经费。二十四军刘文辉的师长杨相臣同陈潜夫友好，陈潜夫通过杨逸邨与刘文辉联系，刘文辉便给陈潜夫二十四军军部顾问的头衔，以表支持。得到这些支持后，敢死队出川抗日的活动才逐渐顺利一些。在敢死队正式建队后，四川军政各界上层人士不顾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禁令，公开支持抗日救国，实属难得。

当时，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战斗愈演愈烈，日方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增援达三四十万之众，十倍于我军兵力，飞

机、军舰、大炮等武器亦比较精良；而十九路军得不到蒋介石的增援，孤军苦战。敢死队员每天争看战报，心急如火，恨不能飞到前线，杀灭日贼。

两组敢死队员18人中有3名女兵：杨逸邨、陈仲柏、石如金。杨逸邨和陈仲柏是射洪人，在“尚志学院”政治经济系同学，杨逸邨参加武装，陈仲柏和石如金任看护。她们都穿灰军服，打黑裹腿，左臂戴黑纱，象征对国土沦丧、同胞惨死的悲伤；黑纱上有“誓死救国”四个白字，像雪亮的利刃；黄布挎包上绣着通红的“勿忘九·一八”五个大字。

2月20日，抗日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终于起程出征。成都市各界1万多人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体育场举行盛大的欢送会。陈潜夫队长致答词时激昂地说：“……亡国奴命运悲惨，不自由，毋宁死！”语言慷慨悲壮，激动人心。他又咬破手指，在一块白布上血书：“倭寇不灭，誓不回川！”陈潜夫的行动，把群众的爱国热情推向了高潮。

在敢死队出川抗日的长途行军中，陈潜夫对队员十分关心，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使队伍顺利地到达了前线。敢死队过徐州时，听车站上的士兵说“冯总司令在养病”，遂派代表前去探望。冯玉祥将军在病榻前亲笔题词：“为民族争人格的主人！你们真是有良心，有志气，有血性，有硬骨的先锋啊！敬佩之至！冯玉祥于徐州病院。”

敢死队走了一个多月，每到一地，群众都热烈欢迎，但不少地方官府却冷眼相看。队伍于2月26日到达重庆时，官府竟明令不准入城，经陈潜夫教授反复交涉，才予放行，分住在男女学校中。敢死队与民众团体联系上后，各爱国组织纷纷来到驻地，赠送“努力杀敌”“国旗”等，深情慰勉。几天后，储材学校集队欢送敢死队上船，并高呼：“敢死队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健儿！”“敢死队是革命先锋！”（连载二）



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

## 人民军队的第一支妇女武装

□ 周文洋

1932年12月，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地区，领导劳苦大众闹翻身、打土豪、分浮财。许多豪绅家的丫头、侍女，富户家的童养媳，贫寒农家的女儿获得解放，她们不但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还踊跃报名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的女兵已达400余人，军团总指挥部决定组建“妇女独立营”，人民军队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从此诞生。随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妇女独立营”也逐渐发展到近千人，总指挥部又将其扩编为“妇女独立团”。

1934年10月，“妇女独立团”跟随主力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每到一地，都有许多家境贫寒、出身苦难的姐妹加入红军，到1935年3月，女兵队伍已壮大到2500多人，“妇女独立团”又扩编为“妇女独立师”，下辖2个团，由军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任师长。

红军女兵建制从“营”到“师”，除担负警戒防务、战地运输、医疗救护、鼓动宣传等任务，还和男同志一样无数次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冲锋陷阵，涌现出能征善战、屡立战功的“开国女将军”李贞和康克清、金维映、王泉媛等等著名女将领。

1935年4月，在攻打剑门关战役中，“妇女独立师”第1团奉命在剑阁城外阻敌援兵。战士们剪掉长发，用乌泥涂黑脸，以防敌人认出是女兵。在敌军发起攻击之前，张琴秋命人抓来一个“舌头”，经审问掌握了敌人的兵力情况，张琴秋命两个营阻击，一个营迂回到敌军背后，实施两面夹击，全歼了敌人的一个旅。同年5月，红军总医院遭川军进攻，“妇女独立师”接受了保卫医院的任务。张琴秋深知敌强我弱，不可硬拼，她指挥部队迅速占领医院四周的制高点，隐蔽待命。待敌人进入最佳射程，一声令下，猛烈的火力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以为被红军主力包围，四散逃命。战士们趁机冲进敌群，打掉了敌人指挥部，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在阿坝州杂谷脑地区，百余名藏匪挟持数百民众做人质，据守一座喇嘛寺与红军顽抗。在政策攻心、劝和劝降无果的情况下，“妇女独立师”第2团2营奉命发起进攻，苦战一天一夜，全歼了匪兵，解救出人质，被藏族同胞誉为“女菩萨兵”。

1936年8月，“妇女独立师”一个连女兵跟护200多名伤员行军，在腊子口的一道峡谷里，遭敌人一个营兵力的追击。连长向翠花、指导员刘桂兰率全连英勇阻击，用大刀长矛与敌人骑兵展开搏斗，最后以全部牺牲的惨痛代价换得援兵到来，让伤员们安全脱险。

长征途中，红军的所有物品，除骡马驮行，还需身背肩抬，“妇女独立师”第2团“兵工营”担负着物资运送任务，全营有担架连、运输连、背粮队等。担架连的100多名女战士负责运送、照顾重伤员。虽雇用了许多抬担架的民工，常有人耐不住艰苦逃离队伍。这时，女战士除自身背弹药、行李等，还要抬担架，体能好的4人抬一副，弱的8人抬一副，不论翻雪山、过草地还是险途险径，她们凭着超凡的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出色地完成运送任务。

长征途中，“兵工营”要负责疏通道路，红军总医院有一台X光机，连同附属的发电机等总共有七八百斤，要六七副担架才能全部抬走。1936年2月，翻越党岭雪山时，遇到一道200多米长的冰坡，光滑陡峭、难以攀登。“兵工营”的女兵们不畏艰难，硬是用石头砸出一级级台阶，把X光机等设备抬过了3千多米的雪山。

1936年10月，“妇女独立师”中的1300多人被编为“妇女先锋队”，随红军西路军渡过黄河，与马步芳匪兵鏖战3个多月，最后有300余人陆续返回陕北，分散到各部队参加抗日、解放战争。

人民军队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的女兵们，以无限的忠诚、执着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在艰难困苦、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恪守初心、不负使命，在铁血队列中扬起一面铿锵的旗帜，为中国革命成功铸就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 见证新四军抗战功绩的荣誉章

□ 李亚清

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烽火岁月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活跃在各个抗日战场，广大官兵英勇无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湖北军民抗战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枚新四军第五师1943年颁发给立功将士的荣誉奖章，让人肃然起敬。

这枚奖章为圆形，铜质涂漆，黄底黑字，基本完整。直径3.3厘米，厚0.2厘米。奖章顶部焊接了一个圆形小孔，穿系圆环和椭圆形挂链，再通过一个圆环与顶端已经锈蚀的挂架相连。奖章正面上方，自右至左镌刻“新四军第五师”六字，中部偏右绘有一名新四军战士手持步枪的威武形象，背景为一颗红色的五角星；下方为长城图案，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抵御外侮的抗战意志。图案内刻有“荣誉章”三字。奖章背面镌刻“坚决抗战，保卫祖国”八字和徽章制作年份“1943”，笔画端整，遒劲有力。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导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同仇敌愾，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下旬，驻扎在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江西、福建、浙江、安

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境内的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于10月被改编为新四军，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辖4个支队和一个特务营。1939年1月，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大队南下豫鄂边区，建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1月，活跃在豫南、鄂中、鄂东等地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鄂豫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建立起鄂豫皖边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军委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理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全军被改编为7个主力师和一个军直属独立旅，其中第五师由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改编而成，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3、第14、第15旅3个主力旅及第1、第2两个地方游击纵队，共1.53万余人，到抗战结束时，主力部队发展到近6万人，民兵等地方武装30余万人。

抗战期间，新四军第五师在武汉外围建立了地跨鄂豫皖湘赣边辽阔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



38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在武汉周边与日伪军进行了殊死斗争，尤其是1942年5月至12月，第五师经受了日伪军一万多人长达8个月的疯狂扫荡。在孤悬敌后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抗战数年之久，新四军第五师有力地牵制了华中日军，实现了对盘踞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进而同全国人民与兄弟部队一起，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新四军第五师广大官兵不畏牺牲，英勇顽强，对日伪军主要作战达1262次，取得了夜袭孝感城、三打侏儒山、血战大山寺等战斗的胜利，击毙击伤日伪军4万多人。目前发现的新四军第五师荣誉奖章，有1940年、1943年、1944年制作的两种，这枚荣誉奖章，就是1943年制作的奖章之一，用于奖励在战斗中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



## 老成都百年酱园“太和号”记趣

□ 王淼

经过苦心经营，太和号逐步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作坊。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后，门市也由正府街一处发展到冻青树街、提督街、玉带桥、东门城门口和棉花街六处。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太和号的总资产达到十万两银子。

太和号的酱系品种享誉百年，诀窍在于讲究质量。胡石庵做生意的六字真言是“人强不如货硬”。从进料到炮制，他从不“踩假水”。

比如，酱油的古法炮制俗称“伏晒秋油”。头年晒，二年沏，三年出油。另外，所用香料也很考究，除了三奈、八角等多达二、三十种外，太和酱油还要用名贵的广香和天津口菜，虽价高而不惜。这样酿出的酱油色正、味鲜，放上一两年也不变质。因此，当时上至南堂餐馆，下至小吃担担，绝大多数都用太和酱油，尤其是牛肉馆，无一

家例外。

太和酱油招牌响，还在于“得其时”。时届晚清，美食成风，讲究烹调，就自然少不了上等的红白酱油来上色搭味。

同治十二年（1873年）春，成都府将军魁玉家正忙着娶儿媳。华堂上张灯结彩。洞房中锦褥丝帐，厨下也忙得不亦乐乎。一天，魁玉前呼后拥地打马而过正府街。当走近太和号时，一家小哥正打开一罐太和酱油出来，想挤到街边看热闹。谁知被一块烂砖头绊了“爬扑”，罐摔得稀烂，酱油倒了一地。一阵风把酱油香气吹得四散，竟让魁玉闻到。这家伙原本饕餮，立刻驻马，看清楚了这家酱园的招牌是太和号，便叫过总管，吩咐把已订的“昌半城”酱油退了，从这次办喜事起，魁府一律改用太和酱油。这话，总管照办不说，街两边看闹

热的人也听得一字不漏。“我说太和酱油比‘昌半城’好哇，你还不信，你看，人家魁将军一闻就闻出来了。”于是，太和号立刻名声大振。据说，一些开酱园的爱在酱园周围洒点酱油或醋以为招牌，就是从这件事学的乖。

### 红白酱油与军阀袍哥参议

接替胡石庵经营太和号的是他的次子胡璧珊。到了民国初，太和号资金雄厚，根基稳固。胡璧珊担心家大业大招人眼红，就只求守成；但守成也难。

太和号历来经营的除了酱系品种，还有黄酒。“元利贞”时还酿得不多，或吃或卖，两得其便。后来，胡石庵见黄酒销路好，就提高酿造量，并在正府街太和号铺面侧面开了一间专卖黄酒的门市。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时，每年酿酒所

用的糯米已达两百担左右。谁知好景不长。1922年，军阀政府的酒税已重得吓人。胡璧珊见黄酒“取头”不大，就停止酿造，并将数百罐窖藏老酒一律封存不卖，留作家用。这批酒，一直吃到解放前夕还剩数十罐。

尽管胡璧珊处处小心，但终究是劫数难逃。1929年，太和号一处约四亩大的作房被人指控为公产，要被当局没收。胡璧珊拿出产权证据再三申诉也无济于事。一打听，才知是被成都人称为“总关火”的向传义支使脚爪爪干的。当时，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盘踞成都，向传义是三军联合公事处处长。鸡蛋碰不赢石头，胡璧珊只好好驾“孔方兄”（钱）买通关节，请“总关火”关照。最后，太和号硬梆梆被敲去两万银元才算了事。（连载三）

